

ABOUT
THE
AUTHOR



徐兆壽 / 男 (1968-)

甘肅涼州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文聯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國家“萬人計畫”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發表長篇小說《荒原問道》《鳩摩羅什》、詩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散文集《西行悟道》、學術著作《文學的紮撒》《精神高原》《人學的困境與超越》等，共計近40部著作，800多萬字。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等報刊雜誌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獲“全國暢銷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20多項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國家藝術基金項目1項，以及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10多項。

黃河文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徐兆壽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陰陽五行是解讀天地運行的最佳符碼。經筆者長期以來對伏羲八卦和九宮思想的研究發現，中華文明從上古時期開始，大致可以梳理為幾個階段：早期昆侖文明的天下觀是以伏羲畫卦為主，根據冰川時代的特徵彩陶、岩畫和天文考古等為佐證以及史書記載推斷，大禹治水的準確時間應該在4300年前左右，再通過《易經》《河圖》《洛書》和《山海經》對青藏高原為主的天下進行考古，發現祁連山正好就是伏羲畫卦時的乾卦，昆侖山（阿爾金山）為坤卦，由此確定了昆侖與河源的位置；到以黃帝開始一直到大禹治水時代的華夏文明時期天人合一思想日趨完善，逐步影響到社會的曆法、文字、禮儀、制度、醫學等方面的發展；直至後來的夏中期開始，歷商周秦，到漢朝最終確立的中原文明時期，天下的中心不斷東移，從黃土高原遷至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先有周文王推演八卦為六十四卦，確立新天下觀，後有周公、孔子和司馬遷對易學的進一步建設和鞏固形成儒學並成為官學，再有北宋五子研讀易學、朱熹重新闡釋儒學經典創建理學使黃河文明持續千年。黃河文明發展到現在以及未來所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文明標準的確立問題，這需要大眾從長久以來固守的中原文明中心說和歐洲文明中心說中跳脫出來，再度將目光鎖定在中國廣闊的西部，通過《山海經》當中的地理方位，結合史書記載、《河圖》《洛書》與《易經》八卦思想，開闢中國文化考古的新路徑，用中國人自古承襲至今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建立起中華兒女真正的文化自信，以此來重新定位中國傳統文化，當是具有中國氣派的中國學派開闢傳統文化復興之路的必要方法。

關鍵字：黃河文明 昆侖文明 華夏文明 中原文明 科學世界觀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Yellow the River Civilization

XU Zhaoshou

Abstract: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best code for interpre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the author's long-term research on the Fuxi Bagua and the Nine Palaces, it can be roughly sor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ancient time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Firstly, the view of the world early of Kunlun civilization was

【作者簡介】徐兆壽（1968-），甘肅武威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

mainly based on Fuxi's drawing of the Bagua. The characteristic pottery, rock paintings and astronomical archaeology of the ice age, as well as historical records, suggest that the exact time of Yu the Great's flood control happened about 4,300 years ago. Secondly,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world centered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with description of the I Ching, the River Chart, the Luo Shu and the Shan Hai J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Qilian Mountains were exactly the Qian Gua when Fuxi drew the Bagua,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Altun Mountains) were the Kun Gua, thus determining the positions of Kunlun and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the time of the Yellow Emperor to the era of Yu the Great's flood control, th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n the Huaxia civilization was increasingly perfected and gradual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erms of calendar, writing, etiquette, system and medicine.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Xia Dynasty, through the Shang,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period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ontinued to shift eastward, from the Loess Plateau to the Central Plains centered on Luoyang. Thirdly, King Wen of Zhou developed the Bagua into the Sixty-Four Gua and established a new view of the world. Then, Duke of Zhou, Confucius and Sima Qian further developed and consolidated the study of I Ching to form Confucianism and make it the official doctrine. Later, the Five Maste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tudied the I Ching, and Zhu Xi reinterpret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o create Neo-Confucianism, making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last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problem that the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has to face now and in the future li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ultural standard. This requires the public to break away from the long-held view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centered civilization, and once again focus on the vast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By combining the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in *Shan Hai Jing*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River Chart*, the *Luo Shu* and the *I Ching Bagua* thought, a new path for Chinese cultural archaeology can be opened up. With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nheri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ancient times, a tru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descendants of Yan and Huang can be established, which is a necessary method for the Chinese scho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open up a new path for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Kunlun civil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一、引言

中國文化的特徵之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對自然的崇尚和以自然為師歷來是中國人的方法論，而自然界最為重要的便是山和水。山為陽，水為陰，一陰一陽謂之道。故而《山海經》中所述者主要是山和水，然後是活動在這些山水間的人。中國的繪畫也以描繪山水為主。中國人的居住環境也總是要求背山面水，即使死了，也一樣要求埋在一個背山面水的地方，生死都依靠著山水。在上古時期，最重要的山是昆侖山和五嶽，昆侖山是伏羲畫卦之地，五嶽則是以五行方法在五方確立的五座山脈，形成環抱之勢，也有背靠山的大意。而水則以黃河為主。從《山海經》和《尚書·禹貢》《史記》《後漢書》等典籍來看，黃河起初是由昆侖山發端的幾條河，其他各山也均有河出，但在大洪水時期大禹開始導水，從最西邊的黑河一直到東海，收納了無數的支流，貫穿了整個北方而形成了一條巨龍一樣的河流，名曰中國河。在最初的典籍裏，河專指黃河，故而黃河就成為中國人的母親河。中國的曆法、思想以及神話也主要在黃河邊誕生，這些文化一直延續到五四，數千年連綿不絕。

所以，從黃河為線來講中國的歷史，是一個非常好的路徑。經筆者長期以來對伏羲八卦、《河圖》《洛書》以及諸多易學體系下的古籍的研究發現，中華文明從上古時期開始，大致可以梳理為幾個階段：早期昆侖文明的天下觀是以伏羲畫卦為主，據冰川時代的特徵彩陶、岩畫和天文考古等為佐證以及史書記載推斷，大禹治水的準確時間應該在 4300 年前左右，再通過《易經》《河圖》《洛書》和《山海經》對青藏高原為主的天下進行考古，發現祁連山正好就是伏羲畫卦時的乾卦，昆侖山（阿爾金山）為坤卦，由此確定了昆侖與河源的位置。這是黃河上游誕生的文明，是黃河文明的第一個階段。從黃帝到大禹治水時代的華夏文明時期，天人合一思想日趨完善，逐步影響到社會的曆法、文字、禮儀、制度、醫學等方面的發展。這是渭河等流域誕生的文明，是黃河文明的第二個階段。夏中期開始，歷商周秦，到漢朝最終確立的中原文明時期，這是第三個時期。此時，黃河中游成為天下的中心。在這三個階段中，天下的中心不斷東移，從青藏高原至黃土高原，再從黃土高原遷至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在第三階段，先有周文王推演八卦為六十四卦，確立新的天下觀、倫理觀和人生觀，後有周公、孔子和司馬遷對易學的進一步建設和鞏固形成儒學並成為官學，再有北宋五子研讀易學、朱熹重新闡釋儒學經典創建理學使黃河文明持續千年。“五四”以後，黃河文明遭遇西方海洋文明的衝擊，昆侖、黃河源頭的地理位置、歷史貢獻及其精神價值被質疑、批判，但隨著中國文化自信力的建設和

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考古工作進一步向西延伸，三星堆、《山海經》逐漸被人們認識，伏羲文化、昆侖文化也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於是，黃河文明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的文化從根本上講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謂“自然”，在中國文化中並非簡單地指大自然，也指一種自在的狀態。換句話說，“自然”既指整個宇宙、天然的一切，包括大自然，也指這一切之中無處不在的一種自在的精神。宇宙之所以如此有規律地運行，便有一種使之能規律運行的自在精神。中國人把它稱為道。人的身上無處不在體現這種精神，人們把其稱之為人道。而人之外的天然世界，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以及那些說得清和說不清的存在，都充盈著這樣一種精神，被道所統。這就是天道。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世界之道，包括時間和空間，而人道卻是以天道為方法在人間設立的道，有人為的跡象。無為而治，“太上，不知有之”^[1]的人道是近乎於天道的治理，人為的痕跡不多，天然的成分極強，所以人間有自在。但這樣的治理只存在於沒有國家的氏族社會，存在於對天道有充分信仰的時代。自從有了國家、家天下之後，人為的一切就越來越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文明就都產生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道法自然”依然是人類最高的智慧。哲學、宗教、法制等則次之。

但另一方面，從“自然”來講，我們人類眼見和所感便是天地間的事物。中國人認為天地間充盈著兩種力量，即陰陽。陰陽的運行後來又被總結為五行，這一點，但凡是讀書人，或者說只要是真正的中國人，被古中國文化浸染的人都是明瞭的，當然不一定能說清楚的。而五行運行的方法則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在於，在“五四”之前，它基本上屬於私塾傳授，或家學，四書五經這些官學是可以私塾相授的，但五經之首的《易經》則往往是家學。陰陽五行和風水地理學從總體上來講也屬於易學範疇，但各自有派別，有方法。所以，我們不能像看待西方早已有之的大學的知識來對待中國文化，尤其是這些早期被天官所掌握的文化。這就導致中國文化一直以來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像今天我們大學裏的通用教科書一樣的教材可以傳授的一般知識，如儒家的四書和五經（除《周易》之外）；另一部分則是代代像秘術一樣傳授下來的道術。我們往往用前一部分知識去解釋世界，但又往往用後一部分知識在構造世界。比如今天我們到處去旅遊所看的帝王陵和很多墓葬、大宅子、城池等，用古人的話說是陽宅和陰宅。建造這些的方法就是秘術。對於一個人、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國家，都同樣在使用，但人們“日用而不覺”。還有各種禮儀，也一樣如此。

這些內容是從哪里來的？這是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過去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它是

中原地區即黃河中游創造的，但百年來的考古發現並非如此，而且越來越多的文獻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知識都一再地證明，中華文明從陸地始終與整個世界有交流——文明也不是一開始就從中原向外輻射，而正如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講的那樣“滿天星鬥”。在近三千多年來，我們才逐漸地建立了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華夏文明。那麼，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三千年之前、五千年之前甚至上古時代的文明從何而來呢？華夏文明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構建起來的？

另外一個問題則來自百年以來我們所接受的西方文明中心說思想。斯塔夫里阿諾斯在2000年左右出版了《全球通史》，他在對亞洲的文明進行研究之後，糾正甚至推翻了原來的歐洲歷史學家所建立起來的歐洲文明中心說。他認為，在公元1500年之前，在大海還沒有被充分地發現和利用之前，人類文明是一個陸地文明，而在陸地文明上，絲綢之路則是一條偉大的文明通道，東邊是中華帝國，西邊是羅馬帝國。而公元1500年以來是海域文明時代，雖然這樣說有些絕對，但從歷史的大勢來講，也確是如此。西方人通過航海認識了大海，然後又發現了新大陸——所以不能絕對地說是海域文明，應當說是海洋與陸地共同創造的文明，但是，西方人殖民世界的道路主要是海路。這就導致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中國則衰落了。在20世紀初，一群學者對雅典文明進行總結時發現，雅典有三個特徵，一是有文字，二是有鐵器，三是有城邦。於是他們想當然地把這三個條件當成人類文明的標準。我們不僅接受了，還按照這樣的方式規劃著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以及考古學的標準，也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夏商周斷代史研究，當然，也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文明探源。我們中國人沒有自己的文明標準。

人們總是說，那三個標準是全世界的標準，為什麼中國人非得有自己的文明標準？人們總說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星空肯定是有國界的，因為人們頭頂的星星的確不同，觀察到的星空和形成的曆法就有不同，而這樣的星空就誕生了不同的神話、信仰、傳說和文明。人們還說科學是不分民族和東西方的，但東方和西方的地質是不同的，人們賴以生活的環境是不同的，中國是河流、土地和樹林，西方是大海、島嶼和金屬，這就導致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不一樣。人們可能會說，數學是一樣的，物理是一樣的，化學是一樣的，但我們中國人定義數的時候是“天一地二”^{[2]333}，數是從認識天和地開始的，西方人呢，現在都不清楚是怎麼來的，以為是商業的交易所得。物與物、時間與時間、空間與空間是相合相沖甚至相刑的，這就是物理。物與物相合便產生美、和諧，正如氧氣和氫氣會產生水一樣，而物與物的相沖則產生爆炸、毀滅。我們不是沒有數學、物理、化學，只是我們從來都不將它們看成無生命的存在，我們永遠都視這一切為生命，是活著的存在。一切都是平等的。物與物平等，時間與時間平等，空間與空間平等。

這一切的誤解在哪里？我們用西方的理論理解中國，在消滅中國文化。而做這些事的不是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所以我要講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意識到，今天我們所運用的知識和思想已經基本西化了，是沒有靈魂的知識，是與中國文化中的一系列概念不一樣的東西。之所以要說這麼多，就是想說，中原文明中心說和歐洲文明中心主義是我們認識黃河文化的兩大障礙，不破除這兩大障礙，我們則只能想當然地人云亦云，則不能有真知灼見。

二、昆侖文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認識出發，我們人類的文明可以確定為陸地文明時期和海洋文明時期，即公元 1500 年前基本是陸地文明時期，有些人把它稱為陸權時期，而把公元 1500 年後的時代稱之為海洋文明時期，或海權時期。這就催生了另一本書的產生，即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這部書的作者弗蘭科潘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他童年時期在阿拉伯世界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在序言裏講他接受的世界史竟然與我們中國人是同一個世界史的教科書，但他感到了強烈的不滿，因為他童年時接受的一切都在這個世界史裏無一體現。事實上，我們中國人也一樣，我們從“五四”以來所接受的世界史便是這樣，我們中國的歷史很少被編入世界史，但我們中國的學者沒有幾個感到不滿的，即使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學者也一樣。

美國的斯塔夫里阿諾斯和英國的彼得·弗蘭科潘都是歷史學家，他們表達的觀點是新世紀以來人類重新看待世界的一種視域、態度、方法和觀點。相比來講，中國的學者擁有這樣一種視角就很晚了。雖然也有一百多年前敦煌學照亮的前夜，但並沒有幾個學者認為從那裏可以重新發現世界。世界的中心仍然在歐美，所以從海上看世界仍然是最為方便的路徑。但生活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的學者和另一些長途跋涉的學者，還是稀稀落落地走在古老的大道上。真正成為潮流已經到 2013 年“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014 年“一帶一路”的提出了。這些年來，已經有很多學者在做這個大課題了。最為重要的是，考古也向西部大規模地進發了。

昆侖便由此再一次出現了。

（一）昆侖與河源

尋找昆侖成為眾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地理學家和文化學者最熱衷的話題。中國西部彩陶的考古發現在一次次提前，已經超過西亞的兩河流域。二裏頭等考古的發現和彩陶文化在一次次地表明夏朝的地理版圖。三星堆的發現則再一次說明中華文明並非漢以來我們所記述的那樣清晰，有很多我們並不知道的古老記憶。於是，《山海經》便擺脫司馬遷以來被認為是神仙

鬼怪之說而不可信的歷史，也同樣成為可考古的中華記憶。

但在《山海經》裏，通篇都寫著兩個字，一個是山，一個是水，故名之《山海經》。而在眾山之中，最重要的山是昆侖山，在眾多河流之中，最重要的則是黃河。所謂“玉出昆岡”^[3]，“河出昆侖”^{[4]720}便是此謂也。

冰川紀最後剩下兩大冰川，即今天我們認為昆侖冰川和祁連冰川，都在青藏高原。兩大冰川在一萬年左右開始快速融化，與當時的冷空氣導致的連綿不絕的雨水天氣，形成了大洪水時代。這一時期一直持續了 6000 年左右。兩大冰川在昆侖山北麓和祁連山北麓形成巨大的水域，也就是傳說中的西海和北海。這些水都在喜馬拉雅的造山運動後順勢流到了北冰洋和東方，逐漸形成了最早的黃河，《山海經》《史記》《後漢書》都有記載，那時叫中國河。具體時間還要根據具體的考古來確證。整個河西走廊在 4300 年前基本上沒有任何文化遺址的發現，這與當時這裏全是水域有關。根據金昌市沙井文化來看，4300 年前這裏開始有了城池，有了馬廠時期的彩陶和石器。這說明大禹導水是在 4300 年前左右，而非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講的 4000 年前。根據《尚書·禹貢》上講，大禹在這裏導黑水，並在這裏建一澤，名為潞野澤。“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5]64}

這裏的“原隰”過去學者們的解釋都有局限，原因在於他們只看到河西走廊的荒漠、乾旱。“三危”也解釋有誤，因為過去周代的邊疆只到達涇渭之界，以西不屬於周之版圖，故而以為三危山也是鳥鼠山旁邊的某座山。這些解釋都是牽強附會。如今，考古學、地理學以及生物學等學科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所以說，西北當時建有兩澤，一為鹽澤，二為潞野澤。分別對應的是九宮中的兌卦和坎卦。鹽澤即後來的羅布泊，漢代時還碧波蕩漾，而潞野澤人們便很少能看到了，其實當時匈奴人稱之為北海或潞野澤或休屠湖或居延海，但是比起羅布泊來，水位就很淺了。今天肯定是看不到了。“厥貢惟球、琳、琅玕”，指的是玉石一類的東西，指昆侖山的和田玉和祁連山西部的酒泉玉。

它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一是大禹治水的時間要往前提 300 年左右，二是大禹導水將黃河改了道。《史記·大宛列傳》中講：

“於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4]714}這裏又多出一海，即西海，在今天的新疆南疆一帶。這是張騫

考察西域得到的報告。意思是，黃河的源頭不是積石山一帶的一個源頭，那裏的水是從於田南山流出來，流到了鹽澤，而鹽澤的水又從地下潛行，流經敦煌之西和阿爾金山東部的當今山口，經過柴達木盆地後才從積石山出來。

可以想象，從大禹治水的 4300 年前到張騫考察西域的 2130 年前左右，中間整整隔了 2200 年。那時，西海還在，北海也在。但現在都不在了。從張騫到現在也差不多 2200 年。這就是滄海桑田。

這裏的西海和玉石等地理環境又與《山海經》中的昆侖山與河源相符。

《山海經·西山經》：“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泛天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杻。”^{[6]58} 又說：“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6]93} 劉安《淮南子·地形訓》曰：“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懸圃。”^{[7]84} “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7]83} “北門開以內（納）不周之風。”^{[7]83} 《山海經·大荒西經》中有九井九門，弱水環繞四周：“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6]391}

總體來講，這些記述和後人的論述都離真正的上古之人的思想體系有差異。比如，大禹治理九州用的思想與他父親來治理時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五行大法，但具體理解不同。《山海經》裏記述了大禹父親是偷的五行方法。《山海經·海內經》中言：“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6]425} 大禹的父親是用土來將水堵起來，但不知道怎麼梳理，往哪里疏導。大禹則不同，《尚書·洪範》中“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5]150} 後又講了五行是什麼，但沒講五行的運行方法。這是關鍵。大禹為何能治理水患，是按照伏羲八卦和九宮思想來治理的。筆者在《補天：雍州正傳》一書中用天文學、地理學、冰川學、氣候學、考古學、文學等方法初步論證了伏羲八卦的方位，其北方就是坎水，但水要流到一個大澤或海便是道法自然，順從天道而為。這就有了大禹把西海和整個昆侖冰川上下來的水都引到鹽澤，然後經過敦煌向南流到柴達木盆地，再流到積石山，所以看起來水是從積石山出發的。從積石山上流出來的水便不再流到祁連山北麓了，而是順著祁連山南麓的河道流到蘭州，再流到寧夏、內蒙古、山西一帶，而涇渭之水和汾水等一併流入此河一同浩浩蕩蕩向山東奔去。整個中國的北方都被這條大河貫通了，它不再是禍患，而成了生成草木的子水了。所以，《後漢書》稱此河為中國河。

大禹又依此把中國的河道分為九條，把大山確立了九座來確定方位，而把裏面多餘的水都引到九個大澤裏，於是也便出現了九個方位的土地，這些統統合起來，便叫九州。這就是大禹的思想。沒有九宮和伏羲八卦的引導和五行的具體運行法則，大禹也只能和他父親一樣。這樣的思想，在今天基本失傳了。人們是很難用它去理解古人，所以也便不能理解歷史了。

筆者在《補天：雍州正傳》中論證，祁連山就是伏羲畫卦時的乾卦，山為陽爻，水為陰爻，正對著的是八節氣的立冬。昆侖山是坤卦之山，昆即坤。兩山合起來也可以如段玉裁所講是倫敘之意，意為倫理。也就是昆侖是講坤卦是倫理所起之地。那麼，敦煌便是兌卦，“兌上缺”的意思是敦煌之西與阿爾金山之處有一個缺口，正好是大洪水從南疆往柴達木盆地流泄之處，也是一條河流，所以即陰爻。

大禹之時，改河道，治水患，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所以，南疆、河西走廊和整個北方便裸露了出來，成為草原、戈壁、沙漠和最初的土地。但這裏形成了早期華夏民族的神話，昆侖和河源也由此而流傳後世。如此過了 2200 年左右，很多西方的民族從遙遠的伊朗高原或其他地方繞道來到北疆，再轉戰南疆和河西走廊，或者就一直漫遊到東北，再從那裏南下，但最後很多又到了河西走廊一帶。我們今天知道的有月氏人、塞種人、匈奴人等。張騫是匈奴人佔領此地時才去考察這裏的。此時，這裏已經不屬於當代學者所講的華夏之範疇，雍州失去已經很久了。人們只知道這裏有昆侖和河源。張騫回來給漢武帝彙報的重要大事此為一件，所以，漢武帝後來就把於田南山確定為昆侖山，而把昆侖山東北流出的塔里木河確定為河源。

塔里木河，維吾爾語意為“無韁之馬”和“田地、種田”，公元前六世紀時名為計戍水，意為十二地支的戌位之河。《水經注》稱為“南河”。《西域圖志》中是蒙古語“額爾色郭勒”，意為“漫流的水”。它有四條支流，它從昆侖山的東北角發出，一路向北，流經樓蘭等地，然後又曲折流至敦煌，所以，它也叫河曲。可以說，它沿著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周。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用肉眼來判斷它的是與非了，只能通過考古來理解它。

（二）《河圖》《洛書》是上古人類智慧的結晶

既然梳理清楚了黃河真正的源頭是今天的南疆於田南山，那麼，我們就要來梳理一下那時中國人的主要思想。但是，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元文明，即昆侖文明。

昆侖山被傳說為天之下都，天下之中。那時確立天下之中的不僅僅是地理，而是天上的星辰，即天文。所以，對天之崇拜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天在對地上發佈著一道道法令。這就是地法天的原理，其實是人們對天道的一個個具體理解而形成的法。而“天法道”^[8]與“道法自然”

^[8]又如何理解呢？這就要用今天的科學來進行天文學考古。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馮時在這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開啟了這一思想的大門。又有不少人用天文考古的方式來對《易經》進行考古。這都是有利於中華文明探源的工作，只是有一部分人將此歸於玄學，不用科學進行嚴密的論證而導致很多人對其工作進行否定。另有一部分人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探源，但只是用西方的科學往前走了一點就再不走下去了，然後就用“科學”這一方法將天文考古否定了。然而，還是有人會一直走下去，用嚴謹的精神來考證，在物理的層面進行印證。這裏就需要首先拋棄中原文明中心主義和歐洲文明中心主義兩種觀念，而是順著古人的思維去進行探索。

天上被東西方人們認為唯一不變的星辰就是北極星，而北極星恰好就在昆侖山之上。這是天文之中。在地理上，整個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是青藏高原。北極星垂直的地方是天下之中，也就是天之下都。或者說，依據天文有固定的中心北極星，人們在大地上也要尋找一個地理的中心，這便是青藏高原上的昆侖山。

所以，我們要考古的並不是大禹治水的時代和地理位置，也不是黃帝時代的華夏文明的中心和地理位置，而是以青藏高原為中心的天下。所以，伏羲畫卦就是在這裏進行的。這裏便是昆侖，便是上古時代所有聖人和女媧、西王母等諸神生活的地方，是神話起源之地。

但是，我們要看，青藏高原為最初的易體，從這裏誕生了天下的觀念。人們可以在這裏觀道，觀天上星辰變化之道，觀天下變化之道，同時也觀萬物與人類生死之道。這些都統統歸於最為簡單的八卦之中。八卦在氣候上是八節，在地理上是八個方位，在天上是八個星象，在地上是八個氏族、動物物種和相應的植物等。這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這是今天我們科學時代難以相信但需要去證明的現象。總之，它要證明一件事情，天地人都是一體的，是天在決定地，然後天地又同時決定人，這樣一個順序便是天人合一。

我們要知道，這樣一個時代正在大洪水時期。但是，冰川融化時代到底什麼時候至什麼時候是大洪水時期還是需要地理學、冰川學、生物學和其他科學嚴密地論證。從今天的卦體來看，伏羲時代北方是坎卦，也即我們所講的後天八卦所表達的思想。

這就說明伏羲所在時代就是昆侖文明時代。這一時代從冰川融化時算起，也就是從一萬年左右開始算，到 4300 年前左右大禹治水時，中間隔著五千多年。這是需要多學科考古才能厘定清楚的歷史。現在我們從留下來的關於《易經》的傳說來看，伏羲做卦時是“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結果。

河，有多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黃河，但具體哪里並不能講清楚；一種說法是河南一帶的黃

河，所以後人把伏羲落實到了河南一帶，還有很多佐證；還有一種說法是指天河，也就是銀河。大概後一種說法最接近於上古時代的思想，因為那時關於時間和空間的確定都以天象為準。至於黃河，前面講了，是大禹導水導出來的，那時還沒有。所以，《河圖》指的是天象，具體講就是天干的運行規律。

洛，也有多種說法，古代一些學者認為是洛水，似乎朱熹也一度相信這種說法。其實洛指的是人的經絡，也是大地的經絡，這就是中醫的出發點，也是十二地支和九宮運行圖。九宮圖與八卦思想一致。關於這些內容，因太過繁雜，可另文討論，在此不贅述。這裏只說其思想範式和形成的文化。

《河圖》到底代表什麼，歷來有很多種解釋，但基本之義是表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黑點與白點各表陰陽交合與運行的狀態。每個方位黑點與白點的各自點數，分別隱喻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東漢鄭玄在《禮記正義·月令》中說：“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9]

《河圖》中的“五”在甲骨文中寫作：“**五**”。一般來講，上面一橫代表的是“天”，這就是天一。下面一橫代表“地”，這叫地二，也是一生二。中間的“交互”代表著溝通、融容，也是陰陽相交的意思。天地交感而成就了各類事物和數字。換句話說，陰陽的運行是以五行為過程。清代江慎修的《河洛精蘊》算是非常精妙的解釋了，但似乎也難以令人信服。

百年來，學術傳播得到了廣泛且快速的發展，西北一些地區的文化也得以發掘和傳播，這就使我們看到了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雲貴高原的文明。筆者發現，關於《河圖》中十位數字的變化之道在中國民間的八字學說和風水地理學中有廣泛應用，除此之外便是曆法上在用。這就說明它與曆法有關。恰好彝族的曆法很快引起筆者的關注。彝族是按天干來劃分一年的月份的，所以是十個月，每個月三十六天，上中下三旬各十二天，以十二地支輪回來計算。這與我們的每年十二個月和每個月三十天剛好相對。我們是以十二地支來算月份，因為我們是以大地為主要資源，而每個月又是十天干來輪回三次，即三個天干的輪回。由於這一曆法百年來不怎麼被知識份子所使用，以至於我們的知識體系中都把這些原來是日常的知識不理解了。

不僅僅是西南地區和長江流域的文化得以發掘和傳播，世界各地文化也在近百年來被廣泛傳播，如此，我們便對世界各地的曆法，尤其是上古曆法有了一些瞭解。筆者發現，在上古時

代，即三千年之前，或者說在我們所熟悉的軸心時代之前，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上古人類遺址，而這些遺址在今天越來越被證明與上古時代人類的曆法相關。筆者還發現，這些曆法基本都有八節氣、十個月的太陽曆，它們都是從天上的星象而得來的，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就說明人類早期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曆法時代。

恰好《史記·五帝本紀》中講，帝堯在登基之後，“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鬱夷，曰旸穀。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4]2}這是一個古老的做法，大概從伏羲時沿襲至帝堯。它既說明伏羲時的“王天下”可能不僅僅指的是東方的中國，又可能是整個四海之內，同時也說明到黃帝和堯舜時的天下已經到了東方的華夏中國。

為什麼這樣說呢？一是我們說我們是龍的子孫，這是從東方七曜的蒼龍來講的。東方的七個星宿構成了一個龍的形象，這就是東方來講的。但這個東方在伏羲時是以青藏高原這個歐亞大陸的中心甚至地球上的最高處（天之下都昆侖）來講的，為什麼中國西部的人不是虎的子孫？為什麼南方人不是朱雀的子孫，為什麼北方人不是龜蛇的子孫？唯獨是龍的子孫。

《洛書》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在那個時代，顯然它與《河圖》一樣都是星象之書。在《洛書》中，充分地體現了天地人合一的觀念。

（三）陰陽、五行思想是人類文明共同的結晶

前文述及，中國人對數的產生與西方所講不同，中國人是從對天地的認識開始的，所謂“天一”“地二”就是這樣來的。這是時間的順序，人和萬物，在東方，為木為三。數學也就這樣產生了。西方目前沒有關於數的起源的權威性記載。另一方面，關於時間的開始也是這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這是時間，也是地理空間，同時也是數的產生，當然也是五行的產生。天為一生水在北方，地生二為火在南方；因為水生木，所以生出天三為木，木又生火，所以生出南方之火；火又生土，於是生出中央土；土生金，金生水；如此一個迴圈，是生生不息的天道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然，時間和空間以及數之間也有相克之理。這便是伏羲時人類的智慧。

在《河圖》《洛書》還是八卦上來看，陰陽首先指的是氣候。一般來講，陽是春夏兩季，

陰是秋冬兩季。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並非獨立存在的陰陽，這是《河圖》中白點和黑點表達的思想。然後，這樣一種陰陽的觀念被形而上化，成為一種方法，於是男人和女人是陽和陰，太陽和月亮是陽和陰，天與地是陽和陰，白天為陽，黑夜為陰。時間和空間也有陰陽，比如，同樣都是木，但寅木為陽，卯木為陰，寅位是陽，卯位是陰，甲為陽，乙為陽。如此下去，無窮盡焉。可以說，大到宇宙，有陰有陽，小至昆蟲也有陰有陽。所以說，“易與天地准”^{[2]336}，又可精準到微茫。

以上思想中國人都非常熟悉，但要再看上古留下來的遺址，也是關於星象和曆法的，目前也只有中國人的易學理論可以解釋，所以說，這是人類共同的文明。其他地方沒有繼承下來的緣故，是因為那些地方的文明都先後中斷了，被那裏的宗教抹去了，而東方的中國這一支始終未斷。

未斷原因最重要的是一個，即大洪水中伏羲和女媧漂到了東方，據說來到了青藏高原的東部天水一帶，也有說到了河南一帶。但筆者以為天水一帶最為合理，因為後面還有黃帝一族繼續向東移的過程。這樣，伏羲文明就由東方的中國人繼承了下來，而其他四面八方則只得其一。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在拙作《補天：雍州正傳》中有詳細解讀，在此也不再贅述。

（四）與玉石、彩陶、神話融為一體

華夏文明探源工作進行了很久，一直是跟著歐洲文明中心主義的觀念在走，對中華文明的原創性認識不足，同時，又被中原文明中心主義觀念所束縛，不能走出這個窠臼。這就無法把來自昆侖或青藏高原的玉石、彩陶、神話接起來，黃河的源頭也始終是個謎。但一旦我們擺脫這兩個觀念的束縛，便立刻被來自古老的文明所擁抱。《易經》的考古、《河圖》《洛書》的天文考古，以及《山海經》的天文地理考古便都有了一方新的天地。

昆侖和黃河的源頭就能看得見，且能說清楚了。顯然，石器是上古甚至太古人類留下的遺物，世界各地的巨人石、金字塔以及祭祀的禮儀都是那時人類留下的文明遺跡。目前也只有中國的易學文化對此能夠解讀。

伏羲時代到底持續了多久，這仍然是要考古的，但它的文明一直持續到了大洪水之後的黃帝時期，這是不言自明的。太古時代的文明在大洪水時代幾乎是集體淹沒，只留下了一些石器的遺跡，但是因為伏羲氏的東移，使得昆侖文明轉向華夏文明的傳播。

岩畫是能證明太古時代人類文明的一個證據，石器是第二個，彩陶則是第三個，隨之而興起的是農業文明。

很多年前的教科書明確寫著兩河流域是彩陶的故鄉，安特生等人認為彩陶來自西方，但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甘肅天水的大地灣出土了 7800 年前的彩陶，比兩河流域更早。這不僅打破了文明西來說，也破除了中原文明中心說。但中國學者關於彩陶的研究多採用西方藝術學的方法，而非中國的或者說非伏羲文明的方法，如此走了很多彎路。這是需要警醒的。

三、華夏文明時代

冰川融化帶來了大洪水的氾濫，傳說伏羲和女媧漂流到了天水一帶，也有說到了西南雲貴高原，還有說到了中原一帶。要說清楚伏羲後來到了哪里，首先得說清楚黃帝的行蹤。這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記載。

顯然，黃帝時講的天下基本上屬於流沙以東的範疇，一直“合符釜山”。到了顓頊高陽帝時“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41]到了帝堯時，“命羲仲，居鬱夷，曰暘穀。敬道日出，便程東作。”^[42]“蟠木”和“暘穀”皆曰扶桑，扶桑在日本。交趾在越南。從堯派天官到四面去駐守觀測八節時日月運行的星象和萬物運動的規律來看，此時的天下已經是昆侖山以東的華夏之地了。

這應當是華夏文明的開始。伏羲文化是昆侖文明，應當是人類文明的源頭，當然也是華夏文明的源頭。那麼，以黃帝代表的五帝時代比昆侖文明更進一步創造了什麼？

（一）天人合一思想更加完善

到黃帝時，除了《河圖》《洛書》之外，還有伏羲的《易經》八卦，陰陽五行思想得到進一步完善。具體來講，有以下改善：

1. 完善曆法。黃帝時代，派大撓氏等對天干地支進行了替換，十天干從原來的闕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默、昭陽簡化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由原來的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涓灘、作噩、闍茂、大淵獻簡化為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此用起來方便，便形成了六十甲子。曆法由此而完善，至今在用。

2. 創造文字。如果說伏羲以山川來畫卦，是形象的創造，也是早期文字的萌芽，而黃帝對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創造則說明文字已經被創造。至於到了甲骨文時，已經到了大量創造的時代，甚至可以說到了很成熟的時期。

3. 制衣冠禮儀。如果說伏羲氏一畫開天，並為人類創造了最初的倫理，使人開始用獸皮來

遮蔽身體，那麼，黃帝時代用絲織品來製作華美的衣冠，便是一偉大的進步。這才是文明的進步。文明雖然也可以從物質層面來講，但畢竟物質財富的創造其最終目的是令人成為人。也就是說絲綢的創造是物質層面，但它是為了完善人的衣冠，這是目的。何謂華夏？雖然也有很多種解釋，比如從字的本義上來講，“華”為花，“夏”在甲骨文中寫作“𠄎”，其象形為蟬，其在夏季形成並鳴叫。蟬以其循環往復的生命形式而被賦予了“永生”，故而“華夏”意為天下像成型的花一樣永生。其二是以地名為解釋。華為華山，夏為夏河，故稱華山以西、夏河流經之地統稱為華夏。若從制衣冠文明的角度來講，華為美服，夏為繁盛，故而華夏之意在文明之昌盛。黃帝時，禮儀得到完善。一個人從生到死，從個人到家庭再到社會的所有禮儀都以天人合一的方式而被創立，這也是華夏之意。更進一步，彩陶的繁華與禮儀相關。一方面，彩陶在此時以濃墨多彩而耀世，令生活充滿了多彩；另一方面，它以各種形象和符號來為死者描繪一個未來世界，並以此來教化活著的人。馬家窯彩陶大概與黃帝為同一時期。如果從這個角度和天干地支的考古去推測，黃帝約在 5300 年前後。

4. 作樂以和人情。禮儀畢竟是對人的限制和束縛，是對身體的遮蔽，所以黃帝學習伏羲、女媧的傳統而作樂以悅情。

5. 創造中醫。用《河圖》《洛書》和《易經》以及天干地支等思想和方法來創造有關人的醫術，一方面以此來教化人們要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來生活，另一方面也以這樣的變化規律來醫治生病之人。所以說，中國人的中醫並不簡單像西醫一樣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思想，一種禮儀，一種教化。

6. 創造社會制度。黃帝以天的方式創造了人與社會、中醫等一系列制度，使天地人合一、陰陽和合、人與家庭合一。同時，還以聖教的形式創造了禪讓制。禪也與蟬大概同義，是以此來完成社會的迴圈，使人類社會生生不息。

7. 創立分封天下的雛形。傳說，早在伏羲時，就將天下分為八正、十方和十二時空。八正是按八卦來分立的，是以氣候為方法。十方是以十天干來確立曆法。十二時空是以十二地支來分野天下。所以說，伏羲時所說就有十二州之立。大禹雖不在五帝之列，但他是禪讓制產生的最後一位聖人。他創立了九州，而這成為後來國家治理的雛形和思想源頭。

以上是在治理黃河氾濫時形成的思想和文化，仍然屬於華夏文明的源頭性文化，但它屬於第二個階段。

四、中原文明時代

第三個階段是中原文明的創立、繁盛和衰落時期。如果說昆侖文明在 10000 年前至 5300 年前延續，那麼黃帝等五帝時期則是在 5300 年前至 4000 年前創立，而延續至 3000 年前的周以前，也有 2300 年之久。從周以來至清末則有 3000 年之久。這便是中原文明時代。我們一般意義上講的中華文明多是這一時期。我們所講的中國傳統文化也主要是這一時期的文化，當然，我們所講的黃河文化也多是這一時期的文化，最多也提及夏商二代而已。

（一）天下與中國思想的建立

1. 周文王演繹八卦為六十四卦，重新確立天道

周代的版圖已經縮小，在西部已經失去雍州、梁州，西北地界到了涇水和渭水以東。青藏高原、昆侖山、祁連山等有關華夏文明的源頭都已失去。但因為此時有了文字，所以歷史有了書寫，那麼，信史就成了文字書寫的東西了。沒有被書寫的傳說一律受到懷疑，或者擱置不談。這是孔子的態度。這樣，原來伏羲和黃帝以及大禹生活的部分區域就被劃為西戎。

黃河的源頭、昆侖之丘以及神話的源頭都開始重新確立。由於大禹治水而將黃河改道，昆侖山和祁連山也遠在西域，聖人們再也無法觀道，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講道：“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2]348} 文王之時，乾坤毀去已經一千多年，所以傳說他被商紂王囚禁在羑裏，夜觀天象，發現星象早已變了。一則北極星值班之星已經從伏羲時經歷黃帝等五帝時代有變，這可以從今天的天文學上得以證明。每隔千年，北極星值班之星會有變化，每過兩萬八千年才會輪回值班。從冰川融化等方面的考古史來看，伏羲到文王至少經歷了 5000 年至 8000 年之久，北極星也至少有四五顆恒星或星宿在值班。天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句話應當反過來講，正是因為天體發生很大變化，所以地球上才發生一系列變故。人類的命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則大禹治水使得整個青藏高原和中國的地理發生了很大變化，易之體發生了變故，所以說乾坤毀，易體不可見。至少再也看不見坎卦了。三是觀景天象的地理位置也發生了變化。伏羲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天之下都來觀測天體運行，黃帝時已經到了東方的黃土高原，文王時雖然與黃帝所在位置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對世界的認識已然不同。雍州和梁州不在了，所以這樣一種形而上的思想體系需要重新確立。這就是文王演卦成六十四卦的原因。

北宋時邵雍等將文王演卦這一時刻也理解為另一時刻的到來，即認為伏羲氏的卦應當是先

天之卦，故而創造性地畫出了先天八卦圖，這樣來理解天地方位、氣候、中國的地理和人體結構也得到了證明和確立，同時與《河圖》《洛書》得到了邏輯上的關聯。而把原來的伏羲八卦確立為後天八卦。這是另一個時期對天地人的理解，當然也是《易經》中講的變易之法。

文王這樣做的目的在於重新確立天道、人道，而這樣推演的結果也可以運用到國家治理、國家命運和人事上，於是殷之滅亡和周之興起便是天命所為，而非簡單的人力所為。同時，經歷了商代人們對《易經》的研究，文王之卦也可以運用到日常事物的預測之中，所以，《易經》在此時就成了全方位可以運用的一門學問。

2. 周公和孔子的進一步發展

由於易體再不可見，八卦之形便成為形而上的符號，《易經》的闡釋學就產生了，由此而形成的理論和各種附會也派生了。昆侖在周時已經是一個傳說，而黃河的源頭也不明，但這反而促使其理論得以生成和完善。在文王的基礎上，周公和孔子是對《易經》八卦和禮樂等貢獻最大的聖人。

周公是文王的第四個兒子，名旦。旦是開始的意思。周公根據聖人們留下來的《河圖》《洛書》《易經》《洪範》等方法和道德範式而將易學上升為國家大法，重新確立國家倫理、家庭倫理、個人倫理，重新確立國家的範式。他在洛陽建立了成周城，並將此命名為中國，意思是國之中，並對諸侯、大人、小人的禮樂進行了制度建設。

由於洛陽在黃河的中游，所以也在一定意義上確立了天下之中的位置。後世人們把《河書》《洛書》和伏羲都盡可能地解釋在這裏，以此來確立中原的中心位置。這樣做的結果使人們不再集體仰望星空，觀測天象，而是由極少一部分人來行使天官的職責，這一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家學，代代相承。司馬遷在《史記》裏也講過，他們家本為天官，後來失去了天官位而變成了史官，這樣一種變遷正是他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10]的天人合一的史學觀念的來源。

孔子的作用是將歷代聖人的學問重新進行整理並編輯，這就是述而不作的內在邏輯。這樣做的結果使聖人們和周公的心學得到文字上的確立，並學術化、知識化了。這是學術下移的重大歷史時刻。孔子對夏商二代歷史的看法是史料不全，不敢隨意確認，但周監二代，史料又全，所以可以作為學術的資料而加以梳理併發揮。學術到了孔子之時，已然非常踏實了。他使過去被私人擁有的家學大乘化了，公開了。他創辦私學，打破公學的貴族化，從而使教育走向平民也使這一學術走向民間，走向平民百姓。

但經過周公與孔子的文化建設，中原的中心地位得到確立，而四周便被正式地邊緣化，就

有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樣帶有道德和文明輕視的概念。這種思想可以上溯到大禹的九州時代，但真正進行一種體制化的運行大概還是在周代。一種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開始在宗法制、分封制、禮樂等制度下逐漸確立。

過去，中央土雖是五方之中，但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與中方並不是不平等的，金木水火土也是平等且相生相剋的，現在，中央土的位置得到升高，木火金水四方降位。中庸思想得以確立。顯然，在伏羲到黃帝之時，中央之位雖有，但四方依然很重要，因為沒有四方的有效運營，中央土是不能生成的，所以天下得以大治，這是公天下的時代。

然而到夏啟的家天下開始，私人、私心、私利形式開啟，這也是馬克思所講的奴隸社會開始的原因。經過夏商二代的紛爭，周雖監乎二代，但家天下的意識還是得到進一步加強。當然，即使如此，我們可以從東周被秦所滅時的情況來看，周天子代表的仍然是天下公理，他所擁有的也只是天下之中這個理念而已。秦將其當成一國而滅，顯然是從伏羲到黃帝再到周公的這樣一種五行運行的思想被打破了。秦雖有邊疆，但再沒有四方和五行的概念，私天下的意識把中原與八方的天道觀徹底摧毀了。

這是天下無道的開始。但自孔子至董仲舒，皆論述仁道，即土德，對金木水火之德並不進行進一步的梳理，而使其淹沒於史海人文之中。所以後世譴責秦之野蠻都擊其無道無德。如此，天道的方法論在此時幾乎喪失。

3. 司馬遷試圖力挽狂瀾

漢武帝在歷史上也有被人譴責的地方，但總體來講，貢獻居多。除了戰勝匈奴外，政治制度的創立是很大的貢獻。他與董仲舒一道完成了三綱五常的制定，完成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天人理論。而在尋找昆侖與河源這件事情也有極大貢獻。在張騫的考察下，他綜合各種前人的學術成果，確定了昆侖山即於闐南山，黃河的源頭即在昆侖山東北處。萬山之祖和河源都確立後，一定意義上講，江山才穩定下來。這就為確立中原文明中心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一切，都由後來的司馬遷以史的方式進行了言說和闡釋。對比來看，《史記》就仿佛希伯來人的《聖經》，仿佛希臘人的《荷馬史詩》和《神譜》，事實上，《史記》比它們都要更加明確和完善，它厘清了五帝以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脈絡。從此，中國人就有了一種歷史的理性精神，有了清晰的崇拜形象，那便是聖人、英雄。如果沒有司馬遷，中國人的這樣一套精神譜系就不可能完成，那麼，中原文明中心主義觀念就缺乏信史，統一的中原王朝就不可能代代相傳。

世人皆贊董仲舒，而輕司馬遷，原因大抵如下：一是董仲舒為國師，制訂了三綱五常的倫

理，統攝國家、家庭、個人和社會，完成了君權天授的新一輪天人契約關係。上一輪是從伏羲至黃帝等五帝時代，是公天下的時代。現在是私天下的時代。這一點，孔子是認識清楚的，但有批判。司馬遷也是以這樣一種思想來敘述歷史的。由於失去天官之位，對天道之運行雖不是很精通，但有家學傳承，所以司馬遷雖不像孔子一樣對《易經》有精深研究，但大體上也是通的。這一點，司馬遷大概是要超過董仲舒的。所以，董仲舒偏於儒家，而司馬遷雖史學方面依孔子，而在道的層面多以黃老為根，也就是天官這一根本性家學。這是他們師徒之間微妙的不同。於是，司馬遷作《史記》，欲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使天人之間有一個統一的聯繫。

這種天人關係，在伏羲時自不用說，在黃帝時已然形成各種各樣的制度，但到孔子和司馬遷時知識化了，枝葉茂盛了，根本卻常常被人遺忘，所以講道德的多，但講道德形成的原理則少了。《史記》中的《天官書》是至關重要的一篇文章，司馬遷之前，幾乎無人著天文方面的著作，這些都是聖人之學，或天官之學，乃私人學問，但司馬遷將此著文放在不顯眼的地方，可以說開了天文之先河。司馬遷還在此文最後寫天道之變數和歷史之變數，這就是能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了。僅僅這一點，就要比董仲舒深邃得多。

二是後來的歷史學家多不懂天道（除邵雍外），所以記述歷史沒有天人合一的章法，自然也對天道記述不多，而多的是人道和歷史之勢的敘述。後來一些史家都講客觀，批評司馬遷之個人的發揮帶有強烈的主觀性，殊不知司馬遷是通天人之際後的道德評述，重在教化後人豈有這樣的智慧和德行以及使命。再則，所謂客觀之歷史又在哪里呢？天道都不明，又何來客觀？

三是近代以來世人多學習西方之史學觀和價值觀，所以司馬遷之史觀多遭遇批判。雖然我們也要承認司馬遷肯定也有諸多缺點，但其大的方面合乎天人合一的學說則已經很了不起了。之所以遭遇西方史學觀的衝擊，原因主要在於中國文化講統一，西方文化則講聯合；中國文化講民主與集中，西方文化只講民主；中國文化講道德的多，西方文化講科學的多；中國文化講敬天法祖，西方文化則是宗教治心……雖有眾多不同，但如果再往上古述及，恐怕中國文化就會佔有優勢，也更為理性和科學。現西方之科學重實物、重邏輯、重理性，看不到虛的、感性的存在，這是只看到了陽性的存在，陰性存在則被否定了。但西方科學之邏輯基礎並不牢固，比如，數字的基礎是道，現在則不單只是數字這個術，而且成為一種公理存在，那麼，是否這也證明道也是一種公理了呢？比如天一、地二、人三，這是中國人發表這三個數字的源頭，恐怕迄今為止這也是人類發明這些數字的源頭，因為這是《河圖》時代的產物，那時是八千年甚至一萬年左右，是伏羲畫卦前就已經有的人類智慧。但是，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到十後又是一

個輪回，在時間和空間上它是要彎曲的，就像鐘錶。我們現在看到的鐘錶是按十二地支或十二星座發明的，但其原理相同。問題在於，我們現在的科學還有這樣彎曲的原理嗎？沒有了。

簡單舉例是想說明西方之科學其實在最基本的原理上與中國上古時代的科學原理是一致的，中國文化恰好繼承了這樣一套原理，但現在竟然會被否定。這就進一步說明司馬遷的這套天人之際的史學理論也會被科學的、實證的西方理論所否定。這是現代性遭遇。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裏講過一套上古時代聖人一直在講的原理，即道法自然的原理。所以有的事物都要經歷生成、發展、旺盛、衰敗、死亡的過程，這恰好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原理。用這樣的理論來看社會的變化之理就很清楚了，所以五百年就是一個大變局，聖人之道經歷了一個生成、發展、壯大、病老、衰敗、死亡的過程，但是，新的聖人又產生了，這就類似於一年要經歷春夏秋冬，然後新的春夏秋冬又會來臨。這樣一套理論今天人們已經視而不見了，反倒相信從人為的實驗室裏搞出來的一切。知識已經從自然走向人為，道也從天道走向偽道。

但這樣一種認識不僅僅是現代人不認識了，古代中國的很多知識份子已經不認識了。所以說，雖然董仲舒、司馬遷所講的道比起周公、孔子已然小了很多，但是仍然還有天道存在，但司馬遷之後這種天道就漸漸消失了。中途雖有韓愈想中興大道，但他只看見儒家的道德教化，對存在於天然的天道與人道則看不見了，所以也只是熱鬧一時便泯然矣。司馬遷千年之後，終於有北宋五子研究聖人之絕學——易學，而得到天理。這就開啟了新的一個時代。

4. 宋代之中興

佛教從東漢引入，在魏晉時期交流頻繁，至隋唐時得以繁盛，並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唐末時，由於佛教的興盛，儒家學說則衰落。唐代滅亡之時，也是中原文明生死存亡之際。五代之時，中原和南部十國並立，而北方又是異族崛起並時時侵擾，所以到北宋時期，中原文明再一次面臨絕亡於天下的災難。北宋五子的張載本欲從軍而建功立業，後被範仲淹勸返，開始研究儒家學說。他先從中庸入手，始終不得法。後經人點撥，開始研究《周易》，始有所得，故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此四句中，最為重要的是“為往聖繼絕學”，而此“絕學”又是什麼呢？這是歷來爭議最大的地方。如果研究北宋五子與朱熹的學說，自然就明白《周易》乃首要，這裏面有天道。有天道自然就有天理，理學便產生。在此基礎上，重新解釋四書五經，便開了宋代學術思想之新局。

北宋五子中最為重要的是邵雍，但他歷來被輕視，而朱熹則被抬得很高。原因也很簡單，朱熹和董仲舒參與了政治倫理的建設，當時就顯於世。此外，人們對天道不能瞭解，自然共鳴

者少。邵雍的《皇極經世》恐學識豐富者也難以入門，至少有十年學習《易經》的功夫才能窺得其理，大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玄奧難懂，故而不能廣行於天下，普羅大眾更是難以學習，所以從這一點來講，朱熹闡述的“四書五經”就顯得非常重要，它既是廣大民眾日常學習和遵守之倫理道德，又是學子們學習的教材。但是，沒有邵雍，就沒有北宋理學之產生。為什麼？因為沒有人能解讀《河圖》《洛書》，沒有人能確立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更沒有人對中國的歷史進行新一輪的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通解。正是在邵子的基礎上，朱熹才有了依靠的天道，也才能夠去解讀“四書五經”。

邵子對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的解讀，以及後來宋時星象學家繪製的星象圖，都清晰地顯示出天人合一的景象。同時，對星空的治理也到了非常詳細的地步。《河圖》《洛書》此時已經基本成為地理之書，也就是說，人們確認《河圖》出自黃河中游一帶的河南，而《洛書》則出自洛水。先前的祭祀之地現在成了產生之地，所以昆侖山不再是遠在西北的於闐南山，而是被符號化和泛化。昆侖山到處都有。這樣一來，昆侖山就不再孤懸於海外，而可以在中原一帶，比如泰山，比如五嶽。同樣，黃河的源頭也不再是問題，因為中原已經是天下之中心。

至此，我們會發現，從伏羲時代以天空中唯一不變的北極星和其普天之下地勢之高的青藏高原為地理標誌的昆侖山為中心的天下，到北宋之後就徹底變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兩個天下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文化上則有完整的傳承性。在伏羲時代的崇尚自然，到宋明理學的崇尚天理與道德，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而言如下：

首先是對科學世界觀的過於形而上學化。理學是在易學研究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它後來過於推崇天道，而對人的自然的本性過於輕視，所以後來就有了“崇天理，滅人欲”的極端思想。

其次是對道德的過於推崇。一方面對天道的過分推崇導致對道德的過分推崇，另一方面對女性的道德治理過於嚴酷，達到了歷史之最。這些都可以從《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看得出來，還有對女性的裹腳、貞烈牌坊的獎勵等都是對女性道德的綁架和自然人性的束縛。

最後則是私天下更為嚴酷的治理。

此三點發展到後來就走向極端，所以“五四”時代人們反的就主要是這三點。這也導致中原文明徹底衰落。此時，黃河文明遭遇批判，到20世紀80年代時則表現為對黃河和長城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而與此同時，長江文明開始顯露，長江流域和雲貴高原上的文化在百年來得到極大的挖掘和張揚。河姆渡文化、彭頭山文化、三星堆文化、楚越文化、良渚文明等相繼成為不同歷史時期的熱點話題。一直處於亞性存在的長江文明終於與黃河文明可以

並肩站立了。事實上，從北宋以後就在物質文明方面領先於黃河文明的長江文明，長期以來在思想精神層面處於黃河文明的壓抑之下。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中原文明中心主義的思想在起決定性作用。

五、黃河文明的現在和未來

如果說“五四”之前的整個中原文明中心主義觀念，也就是天下觀念，是陸地文明時代的產物，是以昆侖山和黃河這兩個重要地理位置而產生的，後來則成為形而上的思想觀念，那麼，“五四”以來引進的西方文化則基本上是海洋文化。而海洋文化在中國基本上是以東南沿海為標誌，這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中看得更為清楚。

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一種大的變局。昆侖山和黃河在北方，所以一定意義上黃河文明也就是北方文明。前面已經述及，儘管從北宋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心發生了位移，長江流域已經超過了黃河流域，但是，從文化上仍然是黃河文明所確立的中原文明中心主義的文化。

“五四”之前，1900年的八國聯軍打破了中國的天下觀。事實上，早在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已經遭遇西學的衝擊，因為日本的崛起被認為是脫離中國文化圈加入歐洲文化圈的結果，張之洞等也已經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李鴻章則斷言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的歷史分野。六十年之後是八國聯軍的再次侵略，此為一個甲子之輪回。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三十年左右以甲午海戰的失敗而結束，是一小變；然後是另外三十年的變法運動，先是戊戌變法、然後是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最後是五四運動，差不多又是三十年，是另一小變。這便是司馬遷在《天官書》中所講的“三十歲一小變”^{[4][16]}。接下來的歷史基本也是如此。五四運動之後的三十年是中國內外戰亂的三十年，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了新局。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被人們總是分為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總之，我們會看到，從1840年開始，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已經發生衝突、交流與融合，現已過了180年，也就是三個甲子年的輪回。中國方法依然可以有效地解讀歷史。2020年，也就是三個甲子年時，正好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這一年，是中國人感覺到歷史發生巨大轉變的一年，中國文化開始有力地抬頭。

過去的180年是非常複雜的三個甲子年，幾乎是每隔三十年就是一個轉折。從中到西，再從西到中，從陸地到海洋，再從海洋到陸地，反復糾葛，反復對話，反復交流。當我們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時候，一定意義上是在否定黃河文明；當我們決定要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時候，首先是從黃河文明開始。地理仍然決定著文明的走向。此時，我們已然忘記了另一個文明的衝

突，即天文的衝突。這是我們尚未意識到的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天黃河文明的現狀與未來，其實已經不僅僅是講中國文化的現狀與未來，而是在講中國文化面對世界文化如何應對和建構了。

伴隨著五四運動而產生的新文化，其新主要來自用西學批判、梳理中國文化，用西學來拯救中國文化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各樣的主義都來自西方，中國共產黨用經驗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變成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它才能夠真正救中國，其他各種各樣的主義因不是執政理論，所以沒有提高到那樣的高度而被自覺地中國化，但事實上，走中國化的理論都在融合中存在着下來，不走中國化的理論都慢慢地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因為雖然作為執政理論的意識形態只是在政治層面運行，而作為日常的倫理和道德則仍然是中國文化。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文化心理並非那麼容易就能丟失的，況且它們還存在於漢字體系中，只要我們還在運用漢字，那麼，中國文化就不可能消失。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就是歐洲人突然看到了羅馬時期的文學，便煥發出無窮的力量，從而改變了自身的文化。

然而，作為被“五四”時期接引而來的西學在各個方面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面而存在，尤其是近代以來的西學，以其強烈的現代性思維和高揚的唯物、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剋星，同樣也是西方傳統文化精神的剋星。也就是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是整個人類與傳統文化精神革命的時代。過去我們簡單地理解為只有中國是如此，但仔細看看，其實它是人類思想運動的共性。在此情況下，以黃土、黃河、長城、昆侖等地理狀貌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就面臨著被批判、革命和汙名化的過程，就像西方延續近 2000 年的上帝精神面臨被革命的書面一樣。同時，因為我們是接引了西方文化而拯救和發展了中國，所以百年以來我們的文化中就自然形成了以西方歐洲中心主義觀念而看待世界和中國的觀念、態度和方法。這幾乎是 19 世紀 60 年代洋務運動以來的基本思路。只有作為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被檢驗，它只有中國化以後才能煥發出調動中國精神的力量，而且，也只有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才能與中國數千年以來的文化相呼應，才能真正地解決中國各方面的問題，使中國文化仍然擁有自身的特性。

我們不妨換句話說，是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內在地要求一切外來文明必須改變自身的方向，與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相結合，才能有效地生存下來，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否則，這些文化將可能成為一股風而流行一時。這也是數千年以來一切外來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的命運。那麼，我們就要問，到底是什麼原因和哪些文化本質在起這樣一種決定性的作用呢？帶著這樣的

問題我們來看看一百多年來關於中華文明的諸多問題。

（一）從“天下”到“萬國”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早在明代徐光啟等引進西方文化和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在中國出現時，原來中國的“天下”格局就已經被打破。那時，也正好是歐洲人地理大發現之時，也就是海洋文明開始書寫的時候。但因為中國之大之遼闊，本可以自足，所以閉關鎖國也能延續明清兩代數百年而繁榮昌盛。真正讓中國人普遍認識到天下是八國聯軍入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近半個世紀，中國人認識到了自己的局限、貧窮、落後，來到了萬國時代。中國不再是天下之中了，而是天下之一隅。一個世紀以來，在文化上我們不停地自我批判與革命，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認同了歐洲文明中心主義觀念，文化自信喪失了。學習西方，走向世界就是走向西方，西方成為天下之中心，而中國變成邊緣之國。在世界史上，中國的歷史可有可無，中國的文化也幾乎被蕩滌一空。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裏，我們傾心全力去學習西方，試圖趕超西方，終於在新世紀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時此刻，我們才回頭反思百年來走過的道路，重新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和生態文明等一系列關於世界的構想，最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

此時此刻，有一個核心史觀值得史家關注，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之變局的來源也在司馬遷的《天官書》中，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大紀而天人之際續備。這是中國方法。在中國方法裏，世界不會一成不變，世界是可以根據天道之運行加上人的全部努力而改變的，當然，中國仍然可以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之一，這是能夠實現的。這是新的天下觀。它在打破歐洲中心主義世界觀和美國一家獨大的霸權主義。事實上，也只有打破歐美中心主義的世界觀，中國才可能獲得文化自信，因為這是最根本最深沉最久遠的自信，然後才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

（二）從虛無主義走向歷史真實

“五四”前後，對中國歷史的懷疑是一次對中國文化的沉重打擊。一方面，魯迅、胡適等新文化先驅為了救國救民而寫下很多急就章，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抨擊，以此來接引或“拿來”西方文化，救國救民，建立共和。百年來，人們對此不知怎麼處理。因為要進一步學習和融合西方文化，就要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但要復興中華民族，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又要反思甚至批判“五四”時期的過激行為，這似乎是一對矛盾。人們之所以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百年來放棄了中國文化道法自然的方法論，而是用西方文化二

元對立的觀念去判斷問題。所謂道法自然，就是中國文化既有春夏之盛，也必然有它秋天的收穫，那麼，也必然會迎來冬天的衰亡。過去中國的歷史不就證明這一點了嗎？所以，沒有魯迅等新文化運動，中國就不可能迎來新的春天。這是要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肯定的地方，但是，經過百年之運行，又到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思的時候。所以，如何運用事物的自然規律去認識歷史，恐怕還得回到中國的方法論中。

另一方面，在歷史、考古、哲學和文學等方面，都學習西方文化精神，使中國的社會科學陷入否定自我的泥淖之中。“五四”以來，歷史學界的疑古主義盛行，很多學者對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進行了各方面的否定。首先，對昆侖和黃河源頭的定位表面上是科學的，事實上只是靠當下目之所及而進行確定，並沒有進行一種歷史的、地理的、天文的、生物學等方面的考古論證。其次，一味認同西方考古學定義的幾個標準，而視中國獨特之地理環境、世界觀、方法論、倫理觀等為虛無，對中國的文字、禮儀、宗教、居住方式、生產方式都以西洋標準而衡量。何以必須以西洋的方式丈量世界，而不能以中國的方式來丈量西方呢？最後，中國的學者竟然學會了用雙標來看待中國與西方。比如，能夠認同歐洲人把《荷馬史詩》《聖經》考古成信史，卻不允許把中國的神話和《山海經》等進行考古。比如，認為西方的一神教是先進的，卻不願承認這是專制思想，而認為我們東方的多神教是落後的，相反，認為皇帝和一黨專政是落後的，這是專制思想，而多黨制又是先進的。比如，在哲學上來看，歐洲哲學從黑格爾的形而上學之後，西方哲學普遍進入沒落階段，但在我們中國的學者眼裏，這才是最好的，而不願承認這是西方哲學的沒落。這些奇怪的思想就產生在我們百年的歷史中，而且不是少數人有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思想，究其根本還是盲目崇拜西方的結果。

百年來，在不斷批判中國歷史文化的過程中，中國人所有樹立起來的形象如伏羲、黃帝、文王、周公、老子、孔子、佛陀、莊子、孟子、菩薩等一個個都被扣上類似於敵人的帽子，要從中國人的心中試圖將其清除掉。不僅如此，還要把我們的先祖的畫像和名字從我們的生活中撕掉，於是，我們會看到現在中國人的家裏和很多公共場所，包括大學教室裏，基本都是四壁空空。過去一段時間，還有毛澤東和馬恩列斯等革命導師與領袖的畫像，現在大多也被撕掉了。中國人來到了一個無名時代，一個無象時代，一個最為迷茫的時代。

如何理解這種現象？從大的方面來看，仍然要用中國道法自然的方法去看，我們就會想到冬天。冬天是肅殺的季節，是萬物蕭索的季節，是無數的動植物死亡的季節，是寒冰的季節，是無名無象的季節，但同時也是新的春天生成的季節。春天為木，冬天為水，水生木，所以沒

有冬天就不可能有春天的輪回。一切事物都在一刻不停地運動中，我們要認識到所有的事物包括思想精神都在運動之中，也在經歷春夏秋冬的輪回。所以，當我們理解了這一點後，就要明白春天已然來臨了。這就是我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寒冬終將過去，春天一定會到來。

過去幾年，特別是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際，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越來越強烈，同時，政府也強力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的弘揚。如果我們相信道法自然的方法論，就要相信這一切都是必然的，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也為期不遠。

（三）用科學的方法重新確立天下觀

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是一個多樣性文化共存的形態，即使那一平等的時刻來臨，它也在一刻不停地變化，它仍然會尋求新的天下觀，而在當今時代，能夠讓所有人都共同認同的世界是什麼呢？它的中心又是什麼呢？宗教、科學、藝術的中心？抑或經濟、軍事之中心？

所有的文化都在重新融合、相互交流或對抗、對話之中，但尋求統一則是大勢所趨。一說到統一，大概很多人又會想到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思想，會以為這只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但他們沒有想過這是歐洲文化幾千年以來的歷史動力，統一性雖然在政治上沒有做到，但在宗教領域則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恰恰只有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宗教往往採取平和的態度，以自願的方式來信仰宗教。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沒有大家認為的那樣的宗教，就是因為中國人在宗教信仰上從來都是寬容的，同時，也與中國人的天道觀有關。

在文章開頭，我們論述了昆侖文明，接著又論述了黃帝時代和周代的文明，這些都是早期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創始階段，天文與地理以及人文之間有一種宏大的聯繫。後來在強調人文精神與道德教化的過程中，把天文與地理這兩個宏觀的背景慢慢淡化了，突出了人文道德與社會管理制度，使得天道慢慢被淡忘了。如子產所講的那樣：“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2]至近代西方科學引入後，所有關於天道的論述都被認為是迷信。這是非常荒謬的。

事實上，中國人所講的天道，恰好與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唯物世界觀有一致性。比如對春夏秋冬四季輪回的認識，這是最為相互的天道理論，人人皆知。再比如，所有事物都要經歷產生、發展、高潮、衰落、死亡的過程，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所論述的。又如，馬克思認為人最低的要求是衣食住行等基本要求，與中國文化中的陰陽之道是一致的。還有，馬克思關於社會階段的更替也與中國道法自然的方法論一致。因此說明，關於天道的認識是可以重新進行論述的。

而科學，這一近代以來被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排斥的方法論，現在也在發展的過程中走過了頭，也有了被汙名化的可能。但是，就目前整個人類的思想認識來講，科學是知識思想的基礎，

這是大勢所趨。那麼，我們又如何用它來重新論證中國傳統文化呢？這也就是我們目前一直在強調的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人類思想的融合是大勢所趨，但歸於何處則是人人未知的事情。中國傳統文化科學化也是大勢所趨，這同樣也會引發我們對科學的重新認識，對科學重新定義，並引導科學走向天道。

首先用天文學對古代中國人的天文學觀念進行論證，對天道進行一次科學的檢驗與修訂。據筆者近年來的粗淺瞭解，天文學是中國學術界的短板。歐洲有 20000 名天文學家，而中國僅有 2000 名。我們要重新認知，對於地球來說，北極星是不是唯一不變的亮星？這似乎仍然是現代天文學上一致認可的觀念。那麼，圍繞北極星，有哪些恒星星團（中國過去叫星象，西方人叫星座）對地球產生影響？更具體一些，中國人的二十八星宿和西方人的二十星座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它們與北極星和地球的關係如何？在太陽系中，地球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其他行星與它的關係怎樣？更具體一些，在太陽系中，五星與地球的關係是否和我們上古時代留下來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思想有關？十天干是哪些星象的運行規律？這些上古或太古時代人類的智慧需要我們今天重新去認識。如果它被確認與我們的星象學知識是吻合的，一個關於天道的科學世界觀是否就產生了？

其次是關於大地和人類的知識，也要用地理學、生物學、氣候學、物理學、化學等重新去認識，大地是如何與天空協作運行的？天空對大地的作用是什麼？大地自身的運動又是什麼規律？更具體一些，十二地支的運行規律如何進行科學地描繪？人在天地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人的生老病死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天地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人與萬物的區別和共同點在哪里？人為什麼會有別於萬物？人為什麼會在天地間生成？等等。

事實上，上述兩部分內容今天已經被很多科學家證明是正確的，但它的傳播和教育則很少。

最後，當我們對上述科學世界觀的論述完成以後，就要重新去揚棄整個人類的文化，如此一來，我們會發現，那個被現代科學證明是合理並正確的上古時代的世界觀，和由此而產生的方法論，恰好是伏羲時代的昆侖文明的文化，它是一萬年前左右全人類共享用的智慧，而這樣一種智慧恰好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在這樣一種基礎上，我們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全人類的文化進行了一次綜合，也進行了一次揚棄，這是否就是人類文明未來最為智慧的命運呢？如果是，它恰好就是中國文化的方向。在這個時候，真正的文化自信就產生了。在這個時候，昆侖就又一次成為人類文明的高峰，而黃河也就清晰地成為東方的中國人所需要的母親河了。

【參考文獻】

- [1]老子[M].桑英波,廖春敏,編.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48.
- [2]伏羲,周文王.周易[M].瀋陽:萬卷出版社,2009.
- [3]周興嗣.千字文[M].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6:1.
- [4]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
- [5]先秦諸子.尚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 [6]劉向,劉歆.山海經[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
- [7]劉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8]老子.道德經[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73.
- [9]呂思勉.國學基礎知識[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365.
- [10]班固.漢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846.
- [11]南懷瑾.南懷瑾講述系列——南懷瑾談生活與生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23.
- [12]左傳 史記 漢書 資治通鑒[M].李敖,主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24.